

游戏与警察



[游戏与警察_下载链接1](#)

著者:[法] 让·波德里亚 著，张新木，孟婕 译

[游戏与警察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看书有点累，不看书我心慌～向老公学习！

包装很好，书发货也比较快，值得买

物流配送很快，包装很好，活动时候买的，很便宜。。。。买书上京东，又快又便宜，赞！

一点点大，唉，提不错的，质量可以。

这个书不便宜，但是包装真的很棒，喜欢这个系列的包装，精品，基本上这个系列的都很棒。这个封面的粉红色和法文版是一样的。没还没来得及细读，翻译应该很可靠。翻译者是翻译界的高手。

翻译比较准确的作品

我很喜欢这个小精装，制作非常精美

让·波德里亚太有才了！

好东西 值得信赖 赞

经典的书，非常喜欢，趁着打折

质量可以，发货有点慢

书的内容不错，包装也不错。

很好的书，一直想买，活动很给力。

书的装帧不错，就是内容看起来有些费劲

很好的书，发货很快，喜欢

十分有学术价值的参考用书！！！

波德里亚曾回顾道：“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由此，足见他在体制内来“反体制”的革命态度，尽管他曾千方百计地要挤进学术体制之中，而且始终生活其中，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得到了基本的认同。

游戏与警察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不错啊，嘻嘻哈哈

赞??

鲍德里亚布希亚波德里亚

让·波德里亚（Jean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家。先后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其代表作主要有《消费社会》、《物体系》、《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冷记忆》、《美国》、《完美的罪行》等。《论诱惑》是其中晚期的思想代表作。张新木，江苏高淳人。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1985年起从事符号学研究，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巴黎圣母院》、《游荡的影子》、《冷记忆》1-5等30余部，编写出版法语教材及参与编写中外母语研究专著10余部，主持和参与国家、教育部及江苏省社科项目5项，主持建设国家精品课程“法语阅读”。2006年获法国政府棕榈教育勋章（骑士），2008年获江苏省第三届紫金文学奖翻译奖。

不错的书

学习中……哈哈哈哈哈，

很好

挺好

长度在5-200个字之间
填写您对此商品的使用心得，例如该商品或某功能为您带来的帮助，或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最多可输入200字

《我看到的你是我自己》是迈克重返游历过的世界各地之后有感而发的旅行感悟，折射出大千世界的万般风景，也感慨了物是人非以及物非人是的种种时光带来的变迁，感情细腻动人，着眼角度别致，文笔妥帖温存，处处洋溢着怀旧的温情，对往事故人的眷恋与关怀。
迈克还为本书新配了四十余幅在旅途中亲自拍摄的插图，为读者生动地展开世界各地风格迥异的那些曾经令作者流连忘返的风景。
《我看到的你是我自己》是迈克重返游历过的世界各地之后有感而发的旅行感悟，折射出大千世界的万般风景，也感慨了物是人非以及物非人是的种种时光带来的变迁，感情细腻动人，着眼角度别致，文笔妥帖温存，处处洋溢着怀旧的温情，对往事故人的眷恋与关怀。
迈克还为本书新配了四十余幅在旅途中亲自拍摄的插图，为读者生动地展开世界各地风

格迥异的那些曾经令作者流连不去的风景。

《我看到的你是我自己》是迈克重返游历过的世界各地之后有感而发的旅行感悟，折射出大千世界的万般风景，也感慨了物是人非以及物非人是的种种时光带来的变迁，感情细腻动人，着眼角度别致，文笔妥帖温存，处处洋溢着怀旧的温情，对往事故人的眷恋与关怀。

迈克还为本书新配了四十余幅在旅途中亲自拍摄的插图，为读者生动地展开世界各地风格迥异的那些曾经令作者流连不去的风景。

这种镇压，在经历层面上被定义为氛围或是默契的镇压，在理论上将从反面进行定义，被定义为分工和分离的总系统。社会暴力如今较少地表现在对冲动的直接压抑，对个体的生理限制，或对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公开压迫，而更多显示为社会关系的网格化，显示为更复杂更系统的隔离，如地理、职业和文化的隔离，表现为不可逆转的技术与社会的劳动分工，表现为需求的无限扩大。分离的原则，即打破欲望的统一性和建立多部门人类活动的原则，与某种孤独的自治和自由相连的原则，它是抵消能量的最有效的原则。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马克思曾经描绘过这种分解的历史成因：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消极的相互规定。在私人领域的幻想式自由中，所有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前来限制日常性，损害日常性的实际意义。只需想想娱乐的“保留”领域便知。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镇压的本质是什么：将自由的向往编目到奴役的图式中。由于在工作和娱乐两方面都得到加强，所以日常性将以同样的方式从两方面得到构建。那些蜗居于廉租房内或簇拥在工作流水线上的人们，他们也只能做梦而已，梦想着符号化的自由，游客爆满的海滩和一望无际的车流。天堂与地狱之间的鸿沟，使得人们只能依照其地狱的模样来梦想天堂。

购书在京东 满意有轻松！

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书很好，我已经快速读一遍了在商店里我们可以看看新出现的商品，不一定要买但可以了解他的用处，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广度，扩宽我们的视野，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不断更新，新出现的东西越来越多，日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而我们购物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分析，不要买些外表华丽而无实际用处的东西，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爱对新生的事物好奇，会不惜代价去买，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我经过朋友的介绍来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去过别的购物网站了。书不错 我是说给懂得专业的人听得 毕竟是小范围交流 挺好，粘合部分不是太好，纸质还是不错的，质量好，封装还可以。虽然价格比在书店看到的便宜了很多，质量有预期的好，书挺好！之前老师说要买但是是自愿的没买等到后来说要背 找了很多家书店网上书店都没有 就上京东看看 没想到被找到了 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

《生命情调的抉择》，主张维持儒家的理想，尽力阐述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确实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会所表现出的抱残守缺阻碍时代的进步，但儒家有其真精神，那些只守着儒家外在躯壳而丢弃内在真精神的人，不是真儒者而是儒家的罪人。

《生命情调的抉择》，主张维持儒家的理想，尽力阐述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确实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会所表现出的抱残守缺阻碍时代的进步，但儒家有其真精神，那些只守着儒家外在躯壳而丢弃内在真精神的人，不是真儒者而是儒家的罪人。

《生命情调的抉择》，主张维持儒家的理想，尽力阐述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确实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会所表现出的抱残守缺阻碍时代的进步，但儒家有其真精神，那些只守着儒家外在躯壳而丢弃内在真精神的人，不是真儒者而是儒家的罪人。

《生命情调的抉择》，主张维持儒家的理想，尽力阐述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确实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会所表现出的抱残守缺阻碍时代的进步，但儒家有其真精神，那些只守着儒家外在躯壳而丢弃内在真精神的人，不是真儒者而是儒家的罪人。

《生命情调的抉择》，主张维持儒家的理想，尽力阐述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确实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会所表现出的抱残守缺阻碍时代的进步，但儒家有其真精神，那些只守着儒家外在躯壳而丢弃内在真精神的人，不是真儒者而是儒家的罪人。

《生命情调的抉择》，主张维持儒家的理想，尽力阐述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确实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会所表现出的抱残守缺阻碍时代的进步，但儒家有其真精神，那些只守着儒家外在躯壳而丢弃内在真精神的人，不是真儒者而是儒家的罪人。

《生命情调的抉择》，主张维持儒家的理想，尽力阐述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确实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会所表现出的抱残守缺阻碍时代的进步，但儒家有其真精神，那些只守着儒家

这种镇压，在经历层面上被定义为氛围或是默契的镇压，在理论上将从反面进行定义，被定义为分工和分离的总体系系统性。社会暴力如今较少地表现在对冲动的直接压抑，对个体的生理限制，或对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公开压迫，而更多显示为社会关系的网格化，显示为更复杂更系统的隔离，如地理、职业和文化的隔离，表现为不可逆转的技术与社会的劳动分工，表现为需求的无限扩大。分离的原则，即打破欲望的统一性和建立多部门人类活动的原则，与某种孤独的自治和自由相连的原则，它是抵消能量的最有效的原则。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马克思曾经描绘过这种分解的历史成因：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消极的相互规定。在私人领域的幻想式自由中，所有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前来限制日常性，损害日常性的实际意义。只需想想娱乐的“保留”领域便知。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镇压的本质是什么：将自由的向往编目到奴役的图式中。由于在工作和娱乐两方面都得到加强，所以日常性将以同样的方式从两方面得到构建。那些蜗居于廉租房内或簇拥在工作流水线上的人们，他们也只能做梦而已，梦想着符号化的自由，游客爆满的海滩和一望无际的车流。天堂与地狱之间的鸿沟，使得人们只能依照其地狱的模式来梦想天堂。镇压的系统性根植于劳动分工。然而在生产层面上所施行的暴力，劳动细化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这些都很少被当做自由来体验：镇压并没有在其中被消费（从该词的所有含义上来说：镇压在此并没有达到完美，也没能品尝自身的形象）。如今对我们而言，更富意味的就是在需求分割中所实施的镇压。因为这种镇压玩弄快乐原则的幻觉本身。所有消费社会的预言家都吹嘘自己能够解放需求，能够促进一种增速的享乐。现代人身上将会出现一种需求的潜在性，只等着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唤醒这些需求，便是解放人类，便是帮助他们挣脱几千年来的压抑。“将自己从超我中解放出来吧，尽情享受生活吧，不一而足。”当然，这些新时代的巫师根据幸福的爆炸式目的性，小心翼翼地解放人类。其目的就是让那些过去被心理机关（禁忌、超我、负罪感）所阻止的冲动结晶到物体上，结晶到这些具体机关上，而欲望的爆炸力将在其中自行消解，社会秩序的礼仪性镇压功能在其中得以物化。非理性越是趋于“自由”，那么基础的需求倍增将越发与高端的控制并驾齐驱，而且其控制也越

发严格。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下述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欲望的压抑要通过需求的解放（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就是“镇压性‘去升华’”来实行——这种解放伴随着一种需求的区分

阅读英国女作家马琳娜·柳薇卡的作品总能带给人太多快乐。这位喜剧天才特别善于在小说中营造一连串的巧合与误会，有着不把人逗笑誓不罢休的劲头。我永远忘不了自己在地铁上看《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时忍不住出声狂笑，以至于被周围的人以疑惑的眼光注视良久的尴尬。不过柳薇卡在接受采访时曾多次表示，自己的小说虽然充满了各类笑料，但最终是要去追问为什么人们生活在一起是如此艰难。的确，这位火遍全球的作家以轻松幽默闻名，但却总是将笔触伸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折磨。

在她的处女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中，来自乌克兰的金发大胸女瓦伦蒂娜嫁给了比她年长50岁的乌克兰裔英国工程师尼古拉，“像枚毛茸茸的粉红色手榴弹”似的在一个英国家庭中骤然爆炸，开启了与尼古拉和他的两个女儿之间无休止的争吵。而在第二本小说《英国农民工小像》中，主人公是几个来自东欧、中国以及非洲的草莓采摘工。他们和瓦伦蒂娜一样对发达国家充满幻想，但在抵达英国后却遭遇了一连串的歧视、欺诈、拐卖、饥饿、流浪乃至死亡，似乎西欧人的和蔼与善良永远不会施舍给第三世界的穷人。到了第三部小说《我们都是胶水做的》（We Are All Made of

Glue），柳薇卡已经厌倦了对乌克兰人的描写，开始为我们讲述二战时就来到英国避难的东欧犹太人夏皮罗夫人的故事。由于近年来伦敦房价飞涨，各方人马纷纷觊觎着夏皮罗夫人的迦南别墅。在经过了一连串误会后，这所空空荡荡的大宅子挤进来一个以色列人和两个巴勒斯坦人。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每天醒来后会以怎样的敌意与愤恨看着自己的邻居。柳薇卡似乎特别喜欢将她笔下的人物置于极端残酷的境地，再以轻松幽默的笔调书写他们的苦难、悲哀以及苦尽甘来的笑脸。

在柳薇卡的作品中，每个人都梦想着在英国开启新的生活，但却始终无法抹去故乡、历史刻在他们灵魂深处的印痕。例如《英国农民工小像》里的安德利和爱丽娜，他们都是乌克兰人，前者是来自顿涅兹克的矿工，后者则是基辅的女大学生，颜色革命在东西乌克兰之间造成的分裂，也在他们中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障壁。安德利和爱丽娜在异国他乡相互扶助并渐生爱意，但总是在缠绵悱恻之际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前者指责后者全盘西化、数典忘祖，后者则辱骂前者因循守旧、甘当俄国人的走狗。读到此处，读者免不了要为他们惋惜，漂泊中的爱情是那样珍贵，为何要为千里之外的政治纷争浪费这般良辰美景？相比之下，住在迦南别墅里的以色列人哈伊姆则显得更加可笑，明明是住在英国的迦南别墅，却非要像远在中东的迦南一样，拒绝与巴勒斯坦人使用同一套供水管线，结果弄得水管爆裂狼狈不堪。最后，笨手笨脚的哈伊姆还是要靠巴勒斯坦人阿里来收拾残局。

种族、宗教、历史渊源、强权政治以及地缘政治带给第三世界的种种苦难与分裂，被这些追求幸福的小人物一股脑地带到了英国。于是，原本无比严肃的政治或宗教立场之间的冲突，在经过时空转换之后显露出荒诞可笑的一面。这一点几乎构成了柳薇卡式幽默的全部来源。在这位英国女作家看来，那些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可怕纷争，不过是因为那里的人们顽固不化地守着某种执念。一旦他们来到了英国，会渐渐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可笑并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因此柳薇卡的所有作品都以大团圆式的结局收场。《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中的瓦伦蒂娜经过与尼古拉一家之间漫长的相互折磨后，同意与尼古拉离婚，回到前夫杜波夫身边。而两家人在分手时，竟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尼古拉更是和杜波夫成为了挚友。《英国农民工小像》里的安德利和爱丽娜虽然仍会因双方在颜色革命中的不同立场而争吵，但他们在英国各地经过的一连串冒险，却让他们笃定地相信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爱人。而《我们都是胶水做的》则是更为极端的例子。柳薇卡笔下的迦南别墅，显然隐喻着以色列的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东欧犹太人夏皮罗夫人、以色列人哈伊姆、巴勒斯坦人伊斯梅尔和纳比勒在经历了最初的猜忌与敌视后，终于在同一屋檐下和平相处，甚至还能一起举办烧烤聚餐。看到此情此景，人们不禁要感慨如果中东的迦南也能这样该有多好！

人人文库，布面精装，可读可藏。

中华书局近日出版了吴藕汀先生著《孤灯夜话》，作为“吴藕汀作品集”的一种，该书是作者晚年的回忆录，内容驳杂，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又有许多嘉兴的故实，读来饶有兴味。

吴藕汀（1913-2005），浙江嘉兴人，词坛名宿、画家、版本目录学家。今刊登该书责任编辑启正所撰之前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吴藕汀先生自幼家道殷实，过着左琴右书的生活，但成年之后，大半人生处动荡之世，个人命运便如一片浮萍之中。即便如此，先生仍能保持“自由之思想，人格之独立”，这于生者而言，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孤灯夜话》是吴藕汀先生的又一本随笔集。由于时代的原因，先生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写在烟盒纸上，或小学生的方格本上，字体大小不一，他人难以辨认，整理这些文字的繁重任务，大部分由其哲嗣吴小汀先生承担。小汀先生说：“先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曾表示，就这样随意地写，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为尊重藕公的想法，保持作品原貌，编辑只根据文字量的多少简单分了九卷，修正了一些整理稿中明显的错讹文字，通过查询相关资料补充了一些整理稿中缺失的文字。《夜话》内容涉及金石书画、版本考据、填词赋诗、种药养虫、人物故实、京昆弹词、社会变迁，可谓琳琅满目。文字处处见性情，像日记，又像时评。面对这样一位知识渊博又有真知灼见的文化老人，就如同坐拥一座格调不俗、藏品丰富的图书馆，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打开这本书，安安静静地读下去。

吴藕汀先生与中华书局的结缘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1958年，经由陈乃乾先生的介绍，藕公第一部作品《词名索引》由中华书局出版。2012年3月16日至31日，中华书局在国家图书馆的稽古厅举办“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展品中有1999年吴藕汀先生创作的一幅绘画作品，主要构图为远衬青山，近着红树，旁有茅屋，两人相对。作品右上题字如右：“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诗，己卯年八月，吴藕汀，时年八十又七。”此作是经由谁人之手交予中华书局收藏，至今已经无从查考。藕公去世后一年，即2006年，中华书局编辑李忠良出差嘉兴，顺道访秀州书局范笑我，恰逢吴藕汀之子吴小汀在场。当即达成了“吴藕汀作品集”的出版意向。自2008年8月以来，中华书局已出版的吴藕汀作品有《词名索引》、《戏文内外》、《药窗杂谈——与伺虞信摘录》、《十年鸿迹》、《鸳湖烟雨》。2013年，适值吴藕汀先生诞辰百年，《孤灯夜话》和《药窗诗话》（增订本）的相继出版，标志着先生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已出齐，这算是对藕公最好的纪念吧。（《孤灯夜话》/吴藕汀著 吴小汀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定价：29元）

吴藕汀《孤灯夜话》里有戚继光一则，曰戚继光，通过买美姬送张居正的手段从而飞黄腾达，生活奢华，人品低下，西湖边不应该建他的塔。余觉甚为迂腐可笑，戚乃王阳明心学传人，知行合一，若他不知道审时度势，岂有后来的一番作为。

微博上多了有个副作用，长篇大论的文字看不大下去了。近日一直在读吴藕汀的《孤灯夜话》，小品文，多是短短几行，类微博。文字却相当有趣，地理风俗，典故食材，信笔写来。里面对一些书与前人的评价多与世俗迥异，如李清照晚年不曾改嫁，水浒诲盗诲淫，红楼、三国与封神作者问题等等，读来甚觉新鲜。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吉恩·布希亚、让·波德里亚等。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知识的“恐怖主义者”。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方面卓有建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做“后现代”的年代，让·鲍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

鲍德里亚于1929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兰斯，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比较，他的成长生涯和心灵历程都具有特殊性。他并没有在知识环境里长大，而生长在祖父母是农民、父母是公务员的法国传统家庭。在高中阶段后，他与父母决裂，这种“决裂的模式”，平行位移式的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生活。作为一位有天赋的学生，他没有沿袭传统的受教育路线，而逃离了大学预备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不得不在教授了许多年的

语言课程后，为得到一份大学的工作而艰苦努力。从60年代末开始，他在楠泰尔学院社会学系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正如鲍德里亚自己的回顾所言：“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从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由此足见他在体制内“反体制”的革命态度，尽管他曾千方百计地要挤进学术体制之中，而且始终生活在其中，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得到了基本的认同。鲍德里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社会的发展，重新思考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鲍德里亚早期的著作关注消费社会的建构以及它如何提供一个价值、意义和活动的世界，并由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的反思几乎完全从他的文本中消失了。随之，模拟（simulations）和拟像（simulacra）、媒介和信息、科学和新技术、内爆和超现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当它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思想和经验时，消除了以往的工业社会模式中所有的边界、分类以及价值。

鲍德里亚对于媒介在构成后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反思是他的争议最多的观点之一，他提供了媒介（作为万能和自发的社会力量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的范式模型。他是于1972年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媒介的挽歌》（Requiem for the Media）的文章，抨击马克思的所谓经济还原论或“生产力论”，开始发展他的媒介理论的。这个题目有点讽刺意味，因为鲍德里亚实际上刚刚开始完善一种社会理论，其中，媒介将在一个新的后现代性的建构中起关键性的作用。而在这篇文章里鲍德里亚其实是在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写挽歌，并认为：“麦克卢汉曾以他那惯有的加拿大一得克萨斯人的蛮横说过，马克思，这位蒸汽机和铁路的精神上的同时代人，在他的有生之年随着电报的出现已经过时了。他以坦率的方式说，马克思在他对于生产的唯物主义的 analysis 中，几乎将生产力定义为一个被授予特权的领域，其中语言、符号和交流通常都被排除在外了。”（CPES，第164页）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激进的质问——在《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1973）中达到顶点，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绝交。

作为马克思主义范畴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媒介理论之例证，鲍德里亚批评了德国活动家和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的媒介理论以及他想要发展一种社会主义媒介策略的企图。鲍德里亚将此种努力作为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加以摈弃，即企图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没有看到大众传播媒介本质上“是反调解和不及物的。它们制造了非传播——如果一个人同意将传播定义为交流，定义为说和答的交互空间，因而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或道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个人的、相互交流关系）——就可以用这个词来刻画它们。它们总是在阻碍反应，使所有的交换过程成为不可能（除了各种形式的模拟反应，它们自身并入传播过程，因而使传播的单方面性原封不动）。这是媒介的真正的抽象化，社会控制和权力的系统就植根于此”（CPES，169~170页）。

一、1889年1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都灵街头抱住了一匹被鞭打的驢马痛哭。很显然，这一行径并没有让他受到动物保护组织的拥护爱戴，他因此被送进了巴塞尔的一间精神病院——尽管瑞士寒冷潮湿的冬天曾让他抱怨不已。在此之前七年，1882，这一年度可能最值得尼采本人铭记的是他生平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失恋，对象是作家、行为艺术家莎乐美（现在的脱衣舞娘还被人称作莎乐美舞者）。但是很多年后，更多人关心的是他在《快乐的哲学》里试图传达的信息，包括那句著名的“上帝死了”。就像现在说起超人，大家想起的都是那个内裤外穿的氪星人一样，这句话里的上帝，也会被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误读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在这个层面上，尼采可能和爱因斯坦一样伟大——没人理解他们，但他们就是这么出名，名气大得足以气死芙蓉姐姐这

样的解构主义艺术家。二、然而被误读的尴尬状况不代表尼采对世俗生活没有影响，相反，二十世纪的历史的推进却让人们在回首尼采时发现他那些意义不明的文字原来可以得到神棍诺查丹玛斯式的解读——两次战争摧毁了人们对文明的信心，迷惘的一代的作家，包括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可以看出，已经开始不由自主地走上了尼采怀疑文明、怀疑理性的老路。

之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又驱使着战后一代出生的青年自觉地抵制一切准则。在引领6、70年代混乱的事物当中，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嚎叫》（Howl）可被看做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的脚注，披头士（The Beatles）的列侬（John Lennon）早期的纳粹倾向则是拜读了《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Vorspiel 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所致。对这个LSD、迷幻摇滚、嬉皮士横行年代的到来，尼采在此之前80年的，关于理性和信仰的批判功不可没，却无人想起。

尼采的名字在二战之后再次被人提起，恐怕要归功于超人哲学的流行。伴随着好莱坞的娱乐化解读，超人变成了那个在电话间换装然后拯救地球的普通白领。但是既然连凯鲁亚克（Jack Kerouac）都开始潜心禅学，那么当年热衷嗑药飙车的小混混也只能纷纷打好领带走进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为老婆的LV和孩子的学费埋单。这时的人们依旧怀疑理性，然而社会生活依旧需要道德和准则去维持。

这就是为什么，尼采被誉为西方世界的命运缩影。出生在牧师家庭，接受着柏拉图主义的世界观和基督教道德的影响与约束；早期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影响，开始以悲悯的目光注视人类的命运；随后便大刀阔斧，清空了社会赖以维系的所有价值观和预言，沉沦于迷惘而不可自拔；最后，伴随着对一切规则的不信任，走向了癫狂的苟存，而人类的前途却依旧如悬崖索桥上的可怜生物一样未知。

三、或许中国人很难感受到“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重量。在几千年的文化当中，从始至终，中国人似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神祇，相反，宗教更仿佛是一种聚合人心的工具，却从来没得到过真正掌握话语权的阶层的信任。“子不语”就很明显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鬼神的态度——知之不详，不如敬而远之。而诸如各种关于“天”的说法，例如“奉天承运”或者“老天有眼”，实际上就像朱熹所言，“天”、“帝”、“道”、“理”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都是不具有人格色彩的客观规律集合。

因此，无论死掉的是上帝还是安拉，神性坍塌并不是值得中国人恐慌的事实。然而精神上无法摧垮的自大却会因为肉体的屈辱而转变，乾隆会因为马嘎尔尼不愿屈膝而震怒，慈禧们却只能面向倨傲的使节奴颜卖好。技术的差异让思想的优劣似乎有了定论，于是在引进强权话语的技术、制度的同时，中国人的思想也不得不随之进行着痛苦的转变，原有的价值观、道德准则都接受着通盘的冲击，理性将语焉不详的国学排挤到了书斋和博物馆，进而开始引导世俗生活的各个角落。

然而理性文明的建立是需要建立在有所畏惧的事物之上的，人文主义将人的自私解放，然而没有相匹敌的事物与之制衡，功利主义甚至是赤裸的自利就成为了必然。就像接受了上帝死亡的欧洲大陆，只需要少部分发现了利用崇高的名义并不至于立即招致恶果的人稍作煽动，两次大战便可以搭上半个地球的生命。

在中国，亦属同理。在拥有信仰的人们奋斗的同时，也总有更多的人将信仰当作了工具。这样的冲突，在社会矛盾激化，国家危机重重的时刻，可能更容易得到答案。就像深受尼采影响的鲁迅，即使生平为人拥有如何多的污点，但是单凭着其行为动机不受私利的驱使，他便理应受到经久不息的爱戴。然而，一旦进入一个稳定时期，对于理想的需求便变得没那么迫切了。在结束战争状态的前四十年，全国民众都逐步成为了偶像崇拜的牺牲品，但是在今天对那些曾经的奴役者，对他们的好评甚至是怀念，依旧受到多数人的认可

现代社会构成的层面上不再有象征交换，不再有作为组织形式的象征交换。当然，象征

作为社会构成自身的死亡仍在困扰着这些构成。这恰巧是因为象征不再管理社会形式，从此社会构成仅认识象征的困扰，象征交换的需求不断受到价值规律的阻碍。虽然从马克思开始，某种革命观念曾试图通过价值规律开辟一条道路，但这种观念早已重新成为遵守法则的革命。精神分析也是围绕着这种困扰展开的，但它改变了困扰的方向，将其限定在个体潜意识中，使其在父亲法则下沦为阉割和能指的困扰。总有法则。然而，除了所有这些在价值舞台上围绕着物质或欲望的生产而旋转的、里比多的、政治的形态学与经济学之外，还有一种建立在价值毁灭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方案，它的模式对我们而言涉及的是原始构成，但它那种彻底的乌托邦开始在我们社会的所有层面上逐渐发展，带来一种造反的眩晕，这种造反不再与革命有关，也不再与历史规律有关，甚至不再与一种“欲望”的“解放”有关——但最后这一点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为它的幻觉是最近才出现的。

在这个视野中，其他一些理论事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索绪尔的易位书写、莫斯（M.M auss）的交换/馈赠——从长远来看，这些假说比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假说更彻底。这也正是遭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阐释帝国主义查禁的视野。易位书写或交换/馈赠不是处在语言学边缘和人类学边缘的奇特插曲，不是低于潜意识和革命这些大机器的次要模式。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显现了一种相同的大形式，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也许仅仅是由于不了解而偏离了这种形式，它一视同仁地驱逐了政治经济学和里比多经济学——此时此地浮现出一种价值的彼岸、一种法则的彼岸、一种压抑的彼岸、一种潜意识的彼岸。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理论事件具有和上述事件相同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冲动。这里的条件是必须将死亡冲动推到极限来反对弗洛伊德自己。无论如何，下面三种情况涉及的都是受挫的参照：必须用莫斯反对莫斯，用索绪尔反对索绪尔，用弗洛伊德反对弗洛伊德；必须建立复归原则（反馈赠）来反对莫斯开启的一切经济学、心理学或结构主义的阐释；必须挑动易位书写的索绪尔来反对语言学的索绪尔，甚至反对他自己关于易位书写的狭隘假说；必须挑动死亡冲动的弗洛伊德来反对在此之前的全部精神分析建构，甚至反对弗洛伊德版本的死亡冲动。

这种悖论是理论暴力的悖论，我们以此为代价就可以看出，这三种假说在各自的场所——但这种各自性恰巧消失在普遍的象征形式中，描绘出了一种运作原则，它完全外在于我们的经济学“现实原则”并与之相对立。

反馈赠中的馈赠可逆性、牺牲中的交换可逆性、循环中的时间可逆性、摧毁中的生产可逆性、死亡中的生命可逆性、易位书写中每个语言单位和价值的可逆性：惟一的大形式，在所有领域中都相同的形式，可逆性的、循环复归的、废除的形式——这一形式在各地都结束了时间的线性、语言的线性、经济交换和积累的线性、权力的线性。对我们而言，它在各地都是毁灭和死亡的形式。这正是象征的形式。它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结构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以前，现实原则对应于价值规律的某个确定阶段。今天，全部系统都跌入不确定性，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吸收了。以后，仿真原则将代替过去的现实原则来管理我们。目的性消失了，我们将由各种模式生成。不再有意识形态，只有一些仿象。因此，为了理解现存系统的霸权和仙境，必须修复价值规律和仿象的全部系谱学——这就是价值的结构革命。必须把政治经济学重新纳入这一系谱学：此时，政治经济学将以第二级仿象的面貌出现，与那些仅用真实——生产的真实、意义的真实——赌博的仿象相同。

资本不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它操纵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商品价值规律的全部机制都被吸收到更广泛的结构价值规律的机制中，进入再循环，并且因此而进入第三级仿象（参见下文）。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在某种机制的范围内由次级永恒性确保的，它在这种机制中丧失了一切特有的规定性，但保留了作为仿真参照的自身有效性。在过去，自然价值规律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它被政治经济学系统和商品价值规律当做想像的参照（“自然”）：这就是像幽灵般存在于交换价值中心的使用价值。但交换价值也通过后来的螺旋式发展，在占统治地位的代码等级中成为不在场证明。价值的每次形成都被其后的形成在更高的仿真等级中重新理解。每个阶段的价值都把先前的机制当做幽灵的参照、傀儡的参照、仿真的参照纳入自己的机制。

革命使每个等级与其后的等级相分离：这才是仅有的真正的革命。第三级是我们的等级，它不再是真实的等级，而是超真实的等级，只有在这里，那些本身也漂浮不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触

[游戏与警察_下载链接1](#)

书评

[游戏与警察_下载链接1](#)